

俗语的进程 ——以意大利语的演化为例

贾冰，汉（1991—）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3级文艺学研究生，610065

摘要：俗语是与官方语言处于对立位置的民间话语系统，拥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生长机制。来自官方语言的过度倾轧会打破语言系统的生态平衡，产生畸形效果。但丁在《论俗语》中言及意大利语与拉丁语的对位关系，提出了俗语在官方语言笼罩下生长演变的案例之一，由此出发进行分析，可以对俗语发展进程产生合理性认知。

关键词：拉丁语 意大利语 但丁

但丁（1265-1321）生活的基督教时期，教会和国家的官方语言为拉丁语，本民族（本土）语言为意大利语，即俗语。在政治环境中，持有不同的话语权与话语形式的各阶层之间彼此对立、却又共同生长；在文化环境中，一方面存在着天主教势力区以拉丁文写成的教会文学，同时也存在着用各民族俗语写成的英雄史诗、骑士抒情诗、传奇、市民文学等代表世俗生活的俗语文学，例如古英语写成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在中世纪的中后期，受各地文化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受法国南部行吟诗人浪漫传统的影响，许多古老的英雄史诗如《罗兰之歌》，及抒情诗和骑士文学作品如《特列斯丹和绮瑟》等，都是用当时各地传统的方言俗语写成的。俗语的发展，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在政治与文化这两重环境中蹒跚而行，因此，俗语演化的最终形态，既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客观要求下必然取得的成果，又是杰出作家在破旧立新主观意志下的积极建构。

就意大利语的发展历史而言，意大利本土通俗拉丁语早在第九和第十世纪就在意大利不同的地方使用了。“第一个被发现证明意大利语形成的史料是‘维罗那谜语’，那是公元800年用威内托方言（通俗拉丁语）写成的。这些文字中原拉丁文的一些动词的尾音已经消失了；第二个史料是9世纪发现的科莫第拉墙的文字。这些文字中使用了定冠词 *ille*，这个词就是意大利语定冠词的前身。”¹随着时间的推移，通俗拉丁语的地位不断提高，实现了下层向上层的反向渗透，知识界逐渐承认并开始使用它。十三世纪用方言写作的作家和诗人在意大利逐渐增加，作为文学语言的意大利语自此获得显著发展。

在官方语言的霸权笼罩下推崇俗语，是以小传统对抗大传统的一种努力，也是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的自觉。意大利语政治与文化环境中生长演化，是俗语发展整体趋势的代表

之一。

一、政治环境：罗马帝国的内在张力

拉丁语本来是古意大利半岛中部拉丁姆地区（古罗马的发源地）和罗马帝国的语言，属印欧语系。公元前六世纪，拉丁人开始用源自希腊字母的拉丁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随后，罗马人成立的罗马城邦四处征战，控制了东起幼发拉底河和黑海，西至不列颠岛，北接多瑙河以北的达契亚（今罗马尼亚）和莱茵河流域，南达北非、尼罗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军事的地界也是文化、语言的边界……语言的成功，似乎首先要靠能打仗，靠肌肉发达”²，于是拉丁语随着罗马军队征服欧亚大陆而扩及到欧洲的其他部分，以及西亚、南亚地区。公元前二世纪，希腊语法传入罗马，罗马人将亚历山大里亚语法体系的原则用于拉丁语，拉丁语便逐步规范起来，以标准形式出现。公元前 27 年，罗马帝国建立时，拉丁语被定为国语。到中世纪，拉丁语便成为古罗马的官方语言，是帝国境内的行政、司法和军队的唯一用语，同时它也是各地上层人士的共通语，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媒介和上流社会学术文化的话语表现方式。

拉丁语在欧洲中世纪重要地位的确立，与基督教在欧洲统治地位的形成紧密相关。基督教普遍流传于欧洲后，拉丁语的影响力更为广泛，从欧洲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叶，拉丁语都是罗马天主教的公用语，宗教学术上的论文也大多由拉丁语写成。现在虽然只有梵蒂冈尚在使用拉丁语，但是一些学术的词汇或文章例如生物分类法的命名规则等尚使用拉丁语。“显然，采用某一民族语作为世界共通语，必然会赋予该民族以超等的特权”³。其他部族的人要想出人头地，迈入社会的中上层，成为官员教师、商人等，必须学习拉丁语。因为拉丁语是法律和军队的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语言，也是权力的语言。

但实际情况在于，由于帝国疆域过大，拉丁语并未享有绝对霸权，希腊语在罗马帝国也享有很高的地位。“在讲希腊语的帝国东部，主要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行政管理就使用希腊语，罗马送往希腊的法令、公文和书信也都是先翻译成希腊语”⁴虽然是征服者的语言，希腊语仍然得到广泛的应用，“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都希望自己掌握两种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演说家昆体良认为儿童在学拉丁语之前应先学希腊语，希腊语在外交活动中广泛使用，一个特别的例子是公元前 131 年的小亚细亚总督会讲 5 种希腊方言，到了西塞罗时期，希腊人在元老院演讲有时可以不用翻译了。”⁵因此在帝国的实际统治中，宏观层面上形成了拉丁语区和希腊语区共处的语言分布格局。“东部人不像西部人那么容易接受胜利者教给他们的语言，这种明显的差异使得帝国的两半染上了迥然不同的色彩，这色彩虽在罗马的繁荣

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但在夜幕降临到罗马世界的时候，却慢慢显得十分耀眼了。”⁶当帝国衰败，武力不能维系庞大的帝国时，罗马帝国就首先按照语言文化的界线一分为二了。

朱利安·班达在《对欧洲民族的讲话》一书中认为：“如果欧洲的居民们想联合起来，那么他们就应该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将优先于他们的民族语言，如同在各自的民族中，民族语言高于方言；而且，他们要给予这种共同的语言一种道德优先性。”⁷朱利安·班达这段换虽然探讨的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建立后的欧洲统一问题，但以此反观罗马帝国时代，语言的不统一为帝国解体埋下了先天性的裂痕：希腊语和拉丁语在罗马帝国的东西部各自盛行，同时，各民族地方语言保持着隐性生长，并以民族文学的形式获得了内在生命力，之后西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亦开始衰落，拉丁语的统治地位受到各民族国家俗语冲击的命运在所难免。

拉丁语的流行得益于辉煌强大的罗马帝国，幸运在于被基督宗教所利用，先是利用来传教然后再用来隔离平民，又被近代科学青睐过，所以才能延续至今，但是从总的趋势来看，拉丁语的流行在古典时期罗马帝国衰落灭亡后便呈现式微之势。

二、文化环境：但丁的不懈努力

意大利俗语文学的成长从诗歌开始，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意大利俗语诗歌深受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抒情诗的影响，意大利的第一个诗派“西西里诗派”与普罗旺斯诗歌传统的关系极为密切。“西西里诗派”的成员多活跃在神圣罗马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1194-1250）在西西里的首府巴勒莫的宫廷，他们用西西里语，而不是拉丁语来写作。弗雷德里克二世死后，西西里诗派迅速衰落，意大利诗歌的中心从南方移至意大利北部的波洛涅亚和中部的托斯卡纳。在波洛涅亚和托斯卡纳，意大利俗语诗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种崭新的诗体走进文学的圣殿，但丁把这种新诗体称为“温柔新体”，其本人也是“温柔新体”诗。《论俗语》是但丁十四世纪初的作品，十六世纪才被发现。但丁在书中阐明了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对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问题起了重大作用。

但丁的创作饱含着他对意大利民族政治命运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有两个最突出的表现：在内容上表现为他对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教会政治的批判，在形式上表现为他对意大利语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的肯定；但丁思想的划时代意义恰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他的政教分离的思想奠定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模式的基础，他在创作中对“俗语”的应用使他成了意大利民族语言之父。但丁诗歌所引起的最早的评论关注主要集中在但丁诗歌的语言

方面，在早期作品中，但丁就尝试为俗语（意大利民族语言）辩护，认为俗语可以做诗歌的媒介。

《筵席》（1304—1307）第一卷是但丁为俗语辩护的第一次尝试。《筵席》的体裁是先写一首俗语的诗，然后用俗语的散文来解释。他在第一卷中申明他使用的理由有三：俗语能达到他的目的；俗语有使用价值；他热爱祖国的语言。《筵席》和《论俗语》两书，前者希望以道德和知识消除各城邦之间与城邦内部各派之间的倾轧、攻伐；后者则批驳只重拉丁语、轻视意大利语的倾向。这不仅表明但丁超越了狭隘的党派偏见，以理性意识思考民族现实与未来的胸襟，而且显示出他对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视，对意大利文学的发展意义深远。正是在对基督教文化中古形态的批判中，在对人文主义的未来发展的忧患中，但丁为个人的前途、国家民族的出路，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提出了总体构想。但丁的探索可以概括为两条道路：一是他在《帝制论》中提出的“外王之路”，即通过改革建立“政教分离”的政治模式，但当时政治的昏暗，皇帝与教皇的普遍腐化使但丁意识到“外王之路”缺乏现实的依据，1313年，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七世病逝，使但丁完全中断了对“外王之路”进行探索的希望；此后，他就把全副精力投放在另一道路——“内圣之路”的探索中，即《神曲》的创作。

但丁基于其民族主义思想，发自内心地热爱俗语，亲切地称之为“我的祖国语言”。为了使地方性的俗语成为“全意大利的民族语言”，但丁一方面对俗语进行理论探讨，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上用俗语进行创作。《神曲》就是这种创作的结晶，他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明确说明创作《神曲》的目的就是企盼意大利人得救，即“使得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摆脱悲惨的境遇，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⁸。通过但丁的努力，他所使用的“托斯卡纳方言成了新的民族语言的基础”⁹。

《论俗语》既是但丁对自己创作实践的辩护，也是对民族语言发展的又一次推动。他分析各地方近代语言的优点和缺点，阐明了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但丁在书中写道：“最辉煌的作家无不用俗语来歌咏这些主题：例如伯尔特兰·杜·波纳之歌咏武功，阿诺特·但尼尔之歌咏爱情。”¹⁰这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当时欧洲俗语写作的盛况。由此可见，欧洲俗语论出现之前，用拉丁语写成的正统的宗教文学和用俗语创作的世俗文学已经大体上在不同的领域内各自发展，文学话语工具长期存在着文言与俗语共生的局面。当时个体的诗人甚至同时运用文言与俗语进行写作，如但丁与他的后继者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诗大部分都是用意大利语写的，而论文则是用拉丁文写的”¹¹，三人是同时使用两种工具进行写作的典范。

三、来自意大利的积极辐射

意大利的标准文学俗语基本上是在没有国家或教会直接支持的情况下确立的¹²，也就是说，它是意大利文化精英们自觉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意大利“民族危机”的回应。

欧洲各国文人在捍卫本国语言和建立本国标准文学俗语的过程中，常常向意大利人寻求思想资源，例如，法国文人约阿希姆·杜贝莱（1522-1560）的《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就以意大利文人斯佩罗内·斯佩罗尼的《关于语言和修辞的对话》为榜样¹³，通过为近代的法文诗歌写作辩护，给俗语写作的法语文学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合法地位。同时，他在但丁“光辉的意大利俗语”理论的影响下提出要改变法语贫乏、粗陋的状况，向古代希腊、罗马借鉴，改换旧词熔铸新意，结合法语中约定俗成的方言、土语，创造新词以丰富法语。163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希留（1585-1642）效仿佛罗伦萨人，成立“法兰西学会”，该学会的宗旨是研究和净化法语，编纂法语词典，树立文学创作的准则¹⁴。

在但丁以后，俗语成了一股不可更改的潮流，逐步取代拉丁语写作，成为文学话语的主流。随着民间俗语文学的兴起，宗教界也相继有一些人放弃拉丁语转用俗语来表达他们供奉上帝的心灵历程。例如西班牙阿维拉的圣特蕾莎和圣胡安，他们写有大量用西班牙俗语写成的抒情诗。另外，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推动了俗语的发展。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了宣扬新教伦理，让宗教教义变得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所接受，用俗语写成了《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小问答》等小册子。

可以说，但丁的俗语论与意大利语的发展演化影响了整个欧洲各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语言问题”的论争对于认识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史和文化史助益良多。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民族国家是国家与民族的结合，它本身代表着政治的权利和文化的观念，两者的相互支撑构成了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基础。本土语言作为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在政治与文化两种力量的作用下逐渐生长、成熟。意大利语的演化过程，是欧洲各国俗语发展的代表案例，也是民族独立大潮下的典型缩影。

-
- ¹ 赵秀英《意大利语的起源、形成和演变》，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5期
- ² (荷)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上)》，赵复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 ³ (俄)E. 德雷仁《世界共通语史》，徐沫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页
- ⁴ Simon Hornblower, Antony Spawforth,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Civi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115
- ⁵ Simon Hornblower, Antony Spawforth,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Civi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115
- ⁶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席代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6页
- ⁷ (法)朱利安·班达《对欧洲民族的讲话》，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 ⁸ 伍全甫《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62页
- ⁹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72页
- ¹⁰ 但丁《论俗语》卷二第二章。引自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8页
- ¹¹ (英)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李玉成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88页
- ¹² Peter Burke,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p.98
- ¹³ Peter Burke,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Oxford:Blackwell, 1998.p.133
- ¹⁴ Frances Yates, *French Academie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 1988.p.290-291